

关于非洲

与孟戈·贝蒂 (Mongo Beti) 之间的采访

1985年11月3日

以下是喀麦隆作家孟戈·贝蒂 (著有《攫取喀麦隆：去殖民化的剖析》一书，在1972年出版时在法国和喀麦隆被禁止发行) 进行的一次书面采访的主要节选。本次采访记录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本次采访原计划发表在孟戈·贝蒂主编的《黑人民族非洲民族》杂志上，但最终未能成功。

孟戈·贝蒂：第一个问题涉及总统的安全和执政当局的未来。面对法国媒体正在发起的恶意宣传运动，许多非洲人认为这是一场全面进攻的先兆，他们不安地想起卢旺达和恩克鲁马，担心会有肉体消除的阴谋。您是否意识到这种危险，特别是非洲人的这种忧虑？您是否意识到了这种阴谋的存在，尤其是通过媒体上的运动？

托马斯·桑卡拉：您给了我重申一个观点的机会，也许您已经知道了。的确，有相当多的人对我们和我们的革命不太满意。我本来要说，鉴于我们捍卫的阶级利益，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有敌人、有阶级敌人是很合理和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决心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们阶级的利益。我们在这样做也是完全有理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到处组织起来对抗革命，用隐秘和不诚实的方式，利用媒体诽谤和污蔑我们所有行动，这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那些资金雄厚、受人指使进行广播的报纸、以及以可耻的方式组织的各种行动的情况，它们完全扭曲了革命的形象。

这种策略是众所周知的。帝国主义曾多次利用它来破坏许多坚定的革命政权，如恩克鲁马、你提到的卢旺达、智利的阿连德等。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确实是一种危险，因为他们在夜以继日地采取手段，试图毒化国际舆论对人民解放斗争的看法。

恩克鲁马、卢旺达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是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阴谋的牺牲品。非洲的英雄子民也都承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和政治家，对非洲和非洲人怀有真挚而伟大的热爱。今天，我们只能钦佩他们，我们感到很荣幸能表明他们是非洲尊严之路上的先驱者、向导和开拓者。

今天，在非洲大陆的四面八方，都有恩克鲁马、卢旺达、蒙德拉内等人出现。如果今天桑卡拉被肉体消除，将会有成千上万的桑卡拉继续接受帝国主义的试炼。就我们的发覆而言，我们人民和革命青年对于捍卫布基纳法索和我们大陆的尊严而进行斗争的决心，消除了任何顾虑。然而，基于千万种原因，我们的人民和革命非洲青年仍然热爱桑卡拉，并希望他永远不会受到丝毫伤害。

贝蒂：我在思考非洲社会腐败的本质。这是殖民统治遗留下的祸根吗？还是我们自己的传统？（毕竟，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为了一把玻璃珠就把同胞卖给奴隶商人的小黑王子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反腐败斗争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您怎么看？

桑卡拉：我并非一名熟悉社会学或前资本主义非洲社会历史的学者，因此我无法得出“腐败是非洲社会的特点”这种结论。腐败毋庸置疑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的现象，一种不发展腐败就无法真正前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它无疑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祸根。所以，要有效地反对殖民统治、殖民主义，甚至新殖民主义，就必须同时反对腐败。

至于那些被殖民者利用的小国王，以及那把玻璃珠，从非洲人的角度来看，并不等同于腐败，因为当时的交易模式是以物易物的。那些小国王用一件或另一件有价值的物品交换了他们的“同胞”。每件物品的价值只取决于它在所处环境中满足需求的实用价值。一个从未照过镜子的国王，为了换取一面镜子而不加思索地拿一名臣民去交换，是很正常的。根据这一事实，他以相应的价值换取了那件东西。因此，即便按照殖民者或探险家所属社会达到的经济体系来看待这种做法是腐败的，他也不能被视为腐败。

贝蒂：这难道不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的一般性问题吗？革命的目标之一是现代化我们的社会，但传统往往会阻碍进步，二者之间不是存在矛盾吗？更确切地说，如果要解放妇女，是不是必须反对割礼、反对一夫多妻制？

桑卡拉：一般说来，非洲的传统是一种落后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在任何事物和现象中，都有进步和落后的一面。在我们的传统中，我们必须学会捕捉其中的进步方面，以便让社会向您所说的进步和现代化更快地发展。革命不是为了使社会倒退。其目标是不断向前发展。革命必将扫除我们传统中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反对一切落后力量、一切愚昧迷信形式的合理斗争，这是解放社会摆脱一切旧思想和陈腐观念的影响和偏见的必由之路，其中也包括那些使妇女边缘化或将其物化的做法。

我认为，为了解放妇女，我们必须反对女性割礼和一夫多妻制，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进行斗争。通过法律或其他手段禁止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为男女平等而战——不是机械的、数学的平等，而是让女性在法律面前与男性平等，特别是在雇佣劳动方面，女性的解放需要她们接受教育并获得经济权力。这样，在各个层面上与男性平等地劳动，拥有同样的责任、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就是反对割礼和一夫多妻制的武器，女性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自己而不是别人来获得解放。

贝蒂：非洲传统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好的东西！例如，部落议事会体现了不断寻求共识的需求。然而，非洲的传统或者它们的残余，从整体上看难道不是在根本上落后的吗？革命过程的必然结果不是文化上的彻底革命吗？

桑卡拉：社会革命是彻底变革社会各个层面的过程，因此每一次革命运动的结果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彻底革命。文化与社会完全相联系，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文化，也没有文化就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

贝蒂：举个例子：对年长者的崇敬。这不正是新殖民主义最容易加以利用的价值观之一吗？因此，法国媒体经常将年长的乌弗埃·博瓦尼与那些质疑他的科特迪瓦新一代进行对比。

桑卡拉：对年长者的崇敬是非洲文化的一个方面，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年长者统治制度作为一种权力体系一直被采用和实行。新殖民主义自然会利用我们自己的体系、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谋求自身利益。年长者的形象作为智慧、经验和功绩的象征，在非洲仍然广受接受，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青年的形象，代表着无经验、不确定和背离常态。新殖民主义深知这些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并打算加以利用，操纵非洲的舆论。为此，法国和西方媒体阻挠了非洲不同代际之间的辩论，试图掩盖某些非洲社会中尖锐的阶级矛盾，认为他们可以扑灭那些渴望终结每天都令国家陷入瘫痪的腐朽旧体制的年轻人的热情。

贝蒂：关于合作，与殖民我们的国家保持特殊关系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为什么你们继续参加法语国家领导人的峰会，尽管受过教育的非洲青年对他们持相当负面的看法？

桑卡拉：从辩证的角度来看，所有事物或行为都是可以解释的。因此，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关系，即使是前殖民宗主国，也都是有解释的，即使只是一个历史解释，就像殖民宗主国那样。在那个层面上，历史的解释超越了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而且我们还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为独立而对抗殖民主义并不意味着在独立后就准备离开地球，将自己孤立在外太空的某个角落。至于与法语国家领导人的首脑会议，每当有机会参加时，我们都会利用这个平台，作为我们革命的跳板，让它为人所知，公开说明我们对这些会议或政治机构的看法。参与其中以谴责违背非洲人民利益的做法，比从外部抛出嘲讽言辞更有利。这就是我们在革命进程中的看法。

贝蒂：关于统治我们的人民，执政的法国左翼与右翼有什么不同吗？您能否向《黑人民族非洲人民》杂志透露您的一些亲身经历？例如，盖伊·彭内曾以何种方式煽动了针对您的政变？

桑卡拉：相较于非洲人民的期望，法国左翼普遍让许多人失望，尤其是非洲的青年人。从1960年到1981年，我们国家独立期间，我们只认识了右翼。1981年5月出现了一个新的、给非洲人带来希望的事件。仅仅将两者相比较就已经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了。然而很快，每个人都意识到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简而言之，就像双胞胎一般。我个人的经历，也是非洲人民的经历，就是在保卫法国在前殖民地（乍得、中非共和国）和殖民地（卡纳克、科摩罗群岛……）利益方面的做法，令人奇怪地想起了福卡特的运作原则。

关于盖伊·彭内发动的政变，它已经充分被谴责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关注，我们无需花时间再次讨论。

贝蒂：关于法郎区。将我们的国家保留在法郎区最常见的理由是非洲法郎可自由兑换。但对占我们社会90%的贫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优势吗？非洲乡村农民对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有何需求？简而言之，非洲法郎不正是统治非洲人的一种武器吗？革命的布基纳法索是否计划继续拖着这副镣铐？

桑卡拉：无论是可兑换货币还是不可兑换货币，对非洲农民来说从未是一个需要操心的问题。他被无意中推入了一个他无能为力的经济体系。我认为有必要组织他们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体系的摧残。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货币与经济体系是相互关联的。

在这个框架下，我要说，与法国货币体系挂钩的非洲法郎是法国统治的武器。法国经济，进而法国的商业资本家，通过这种联系和货币垄断，在我们人民的背上积累了财富。这就是为什么布基纳法索正在通过人民的斗争来建设一个独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从而努力终结这种局面。这需要多长时间，我无法说。

贝蒂：关于技术援助：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将其视为一个时间问题。您认为需要多长时间，布基纳法索才不再需要非非洲技术援助？您是否有一个策略来招募非洲技术顾问？是什么？

桑卡拉：这非常难确定，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大量技术和财力资源的复杂领域。但最短的时间越好。除了加强南南合作在技术援助方面的合作，没有更好的策略了。任何想与我们讨论向布基纳法索提供援助的人都是受欢迎的。布基纳法索大地是一片自由友好的土地，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都是兄弟般的友谊。因此，布基纳法索人民准备欢迎任何想来与我们共同努力建设新社会的人。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策略。

贝蒂：关于泛非主义；现在几乎没人谈论它了。因此，非洲青年今天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对他们来说，泛非主义曾经有神秘的、振奋人心的非凡力量。您是否打算重新捡起恩克鲁马的火炬？通过什么方式？也许是通过区域性融合？

桑卡拉：是的，泛非主义在它最纯粹的形式上曾为非洲人乃至世界各地的黑人燃起了伟大的希望。关于这一政治现象，已经有很多评论，今后也将有更多。我不打算在这里详细阐述。但我认为，如果非洲人真的希望摆脱一切外来统治，这确实是非洲人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面对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其他滥用，恩克鲁马完全有理由将整个大陆的统一寄予厚望，就像今天每个人都怀着苦涩所注意到的那样。尽管如此，这个理念依然存在，作为非洲爱国者的我们，有责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奋斗。所有泛非主义者都有责任让非洲重燃希望，重新捡起恩克鲁马的火炬。

贝蒂：关于法语和法语世界。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法语的地位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事实。而“法语世界”这一概念则是一种控制我们创造力乃至未来的策略。您是否认同这种区分？您是计划用布基纳法索的民族语言取代现有的官方语言法语？还是认为法语必须继续长期或永久扮演这一角色？

桑卡拉：我完全同意您对此的区分。有一个历史事实，也确实存在一种新殖民主义策略。关于“法语世界”这一概念，它别无其他，不过是一种新殖民主义策略。不幸的是，维护它的不是法国人，而是“非洲人”自己。这是一个悖论，但可以彻底解释为非裔者的同化和完全文化异化的结果。

就布基纳法索而言，我们正在对教育系统进行全面改革，民族语言和法语的地位问题处于这场辩论的中心。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但事态似乎正在朝着将法语作为我们众多民族的统一语言的方向发展；从效率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最佳方式来看是这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民族语言会被抛弃，绝对不是这样。

一般而言，语言高于阶级，作为革命者的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利用法语来维护我们阶级的利益。正是在这一框架下，我们应该创建自己的机构，建立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机构。否则，鉴于我们基本上遭受来自法国的文化侵略的有害影响，我们的斗争将无法取得成功。在我们现有的环境下，革命首先是一种思想解放。要取得任何胜利，我们必须尽快做到这一点。

贝蒂：关于无计划的城市化：我观察到两个非洲城市，即阿尔及尔和布拉柴维尔。尤其是阿尔及尔。一旦贫民窟居民被安置到政府补贴的住房，他们就会立即迎来农村移民的“洪流”。政府领导人拼命追赶这种疯狂发展的首都，最终非洲各大首都将吞噬掉各自国家的整个预算。在瓦加杜古你是否也面临这种状况？在不采取极端手段（如波尔波特）的情况下，您是否认为有必要终止这种危及我们发展的殖民遗产？因为殖民城市是为殖民者而非非洲人建立的。

桑卡拉：相比之下，瓦加杜古人口并不像布拉柴维尔或阿尔及尔那样庞大。但这种现象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通过大规模住房开发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贫民窟都被拆除，以便在原址上建造体面的住房。第二年住房项目、第三年项目、SOGOGIB住房项目、8月4日项目、普及住房等，都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

在这一框架下，我们正努力尽可能减少城乡差距，通过在农村地区发展各种基础设施来使农村生活更加宜居，从而减缓农村人口外流。我们正在农村建立社会文化中心、群众娱乐中心、电影院、舞厅和现代音乐团体。对于某些殖民遗产，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同时注意消除它们的有害影响。城市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

贝蒂：现在让转入更加私人的领域，它可能带有一点色彩性质，并且不幸地迷惑了大众。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已经多长时间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你被指责（当然是卑鄙的指责，你可以理所当然地反对称这种指责根本不值得回答）执行的政策是出于个人报复，而非出于意识形态选择。也许是时候让你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桑卡拉：现在，我是一个反帝国主义者，作为你们的同志总统，这也是如此。我们认为这源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对于造福我们的人民而言，这就足够了，尤其是当他们不费心去给领导人贴标签，而是首先根据他们的革命行动来评判他们的时候。后续我们将继续观察。